

丁玲和张爱玲“欲望化”书写的比较研究

闫寒英

(南华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作为女性主义作家, 丁玲和张爱玲以女性体验书写女性欲望, 探讨五四运动以来女性的困境及突围策略。但她们对女性欲望的聚焦点不同: 丁玲聚焦于女性精神欲望的发展, 张爱玲则聚焦于女性物质欲望对于女性生存的本体意义。她们的写作在时间上连续, 在内容上互补, 共同凸显了 20 世纪 20—40 年代中国女性欲望化诉求之艰难曲折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 欲望; 女性; 精神; 物质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0)02-0089-04

中国漫长的封建制度仿佛沉重的羽翼, 覆盖在女性的上空。在男权重压下, 传统的中国女性历来以温良恭俭、清心寡欲的面目浮现于历史地表。中国古代仕女画典型的描摹了这一情状: 画中的仕女们基本上千人一面, 表情安详; 她们眼睛眯缝, 瞳孔居中, 从中几乎窥见不到个性与欲望。然而, 压抑与抗争总是相伴而生, 中国女性的“欲望”被钳制了几千年, 终于在 20 世纪初期, 借助“五四”新文化运动如岩浆喷发。为女性欲望代言的女性主义书写也在“人的觉醒”和“女人的觉醒”之碰撞、融会中成长, 一大批具有强烈女性主体意识和求索精神的女作家在文坛集体亮相, 她们以叛逆者的姿态发出各自独特的“欲望化”呼声。在这批女作家群中, 冰心将基督教的博爱情怀与中国古老的母性传统相融合, 建构、演绎了现代淑女的神话; 丁玲绕过冰心的神话, 以新的形象系列重构了知识女性自恋以及追求性爱乌托邦的神话; 而张爱玲则塑造了在物欲中挣扎的世俗的女性小人物, 以冷酷的笔触无情的解构了“五四”女性神话。

从“欲望化”书写的角度来看, 丁玲超越了冰心、庐隐、冯沅君等笔下或柔弱困惑、或绝望抗争的女性形象, 已经从女性欲望的觉醒走向了女性欲望的张扬, 与张爱玲对女性欲望淋漓尽致的挖掘, 具有精神血脉上的同构性。只是这两颗双子座光芒的聚焦点不一样: 丁玲聚焦于女性精神欲望的发展, 张爱玲则聚焦于女性物质欲望对于女性生存的本体意义。两种“欲望化”书写不仅在内容上互补, 也在时空上相互承接、照应, 完整的凸显了 20 世纪 20—40 年代的中国文化语境下, 中国知识女性对自身命运、所处困境的深刻体认和深入思考, 以及相应的突围策略。

1930 年, 丁玲在北京、上海进行早期创作, 发表了小说《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阿毛姑娘》, 这四篇小说结成她的第一本小说集《在黑暗中》, 《在黑暗中》反映了时代女性欲望的觉醒与困惑, 是典型的个性主义、女性主义书写。

然而, 从当时文坛影响力最大的左联的立场来看, 这些表露女性生理、心理欲望的小说, 有着不良倾向。如左翼作家冯雪峰在其文章《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中, 就对丁玲早期小说作了“清算”: “丁玲在写《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以及写《阿毛姑娘》的前期, 谁都明白她乃是在思想上有着坏的倾向的作家。那倾向的本质, 可以说是个人主义的无政府性加流浪汉的知识阶级性加资产阶级的颓废和享乐而成的混合物。”^[1]冯雪峰是用以阶级论、集体论、革命论为核心的左翼话语来评价丁玲早期小说, 这样的评价显然带有强烈的政治功利性, 甚至男权色彩, 但也恰恰从侧面凸显了丁玲以自己原生态的生命体验对时代“新女性”生存状况、心理欲望的真实刻画。

作为五四之后涌现的“都市摩登女郎”的代言人。丁玲揭示了这些具有独立思想、自我意识的现代知识女性三个层面的精神欲望。

其一, 自主生存的欲望。

丁玲曾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 崇尚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个人主义, 对于人的“解放”状态有着乌托邦式的想象, 并以自己的生活切身实践。她在一篇文章中作了这样的描绘: “我们碰到许多人, 观察过许多人, 我们自我斗争……我们自己遨游世界, 不管它是天堂或是地狱。当我们把钱用光, 我们可以去纱厂当女工、当家庭教师, 或当佣人、当卖花人, 但一定要按照自己的理想去读书、去生活, 自己安排自己在世界上所占的位置。”^[2]与其个人主义信念一致, 丁玲笔

丁玲对女性欲望的书写集中在她早期作品中。1927—

[收稿日期] 2009-10-23

[作者简介] 闫寒英(1975—), 女, 湖南常德人, 南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下的摩登女郎基本上都是“叛女”，反叛包办婚姻，反叛腐朽的伦理道德，反叛社会为女性规定的约定俗成的生活模式，渴望主宰自己的生活与命运。她的处女作《梦珂》就描绘了这种理想。《梦珂》由学校(求学)、都市中产阶级家庭(恋爱和婚姻)和大众文化工业(工作)这三个空间段落组成，在每个段落梦珂都作了“自主”的努力，或者说自我挣扎。从姑妈家出走之后，梦珂曾仔细思考过自己能做什么，这是“娜拉走后怎么办”的问题。当然梦珂最终是无奈的，她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即隐忍地生活于纯肉感、污浊的社会。丁玲不是在理性层面上讨论“娜拉走后怎样”，而是在都市消费文化、社会凝视逻辑、女性阶级分化等背景下，以图景化的描摹方式来展现女性解放的窘境：女性解放的口号因无法回应分化了的社会处境而显得无力，女性的独立人格在现代体制建立的商业化语境中被异化。面对这种情形，女性如何寻求新的解放，以实现自主生存的欲望呢？这是后五四时代丁玲持续追问却无法回答的问题。《梦珂》宣告了女性自主生存的欲望在时代面前的破灭。

其二，灵肉合一的欲望。

美国学者白露认为丁玲“有点象俄国人那样把女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融为一体”^[3]。无政府主义在性爱问题上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从一种激进的政治乌托邦衍生出更为激进的“性爱乌托邦”，是五四时期中国无政府主义传播的突出特色。对于青春期的丁玲而言，这股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性爱狂潮，无疑对其性爱观的形成产生巨大的塑型作用，因而丁玲的早期小说就成了女性追求性爱乌托邦的典范文本。“性爱乌托邦”反对传统的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婚姻模式，也反对传统的礼教束缚，倡导性爱对婚姻、家庭的超越。但丁玲理解与接受的“性爱乌托邦”并非彻底的性解放，而是包含强烈的“性灵”成分，即追求一种既肉体销魂又精神相融的灵肉合一的境界。当身体的欲望已被唤起，而精神的交合却存在障碍时，便会产生“焦虑”的欲望困境。莎菲式的个人主义者自我分裂的痛苦便是这种欲望困境的典型表达。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莎菲女士的日记》象一枚炸弹，震惊当时死寂的文坛。从中国文学的女性叙事角度来看，莎菲的意义在于第一次表达了肉身焦虑。莎菲处于身体欲望的焦渴中，这是正当的生理诉求；而作为“新女性”的莎菲，又有对高尚情爱的心灵欲望，灵肉合一一是莎菲最高的欲望和理想。但在现实中呈现的却是凌吉士丰仪的外貌与庸俗灵魂的分裂，这种分裂转化为莎菲的分裂，使她陷于痛苦中。莎菲在日记中淋漓尽致的刻画了她的矛盾：“我应该怎样来解释呢？一个完全癫狂于男人仪表上的女人的心理！自然我不会爱他，这不会爱，很容易说明，就是在他丰仪的里面是躲着一个何等卑丑的灵魂！可是我又倾慕他，思念他，甚至于没有他，我就失掉一切生活意义了；并且我常常想，假使有那么一日，我和他的嘴唇合拢来，密密的，那我的身体就从这心的狂笑中瓦解去，也愿意。其实，单单能获得骑士般的那人儿的温柔的一抚摩，随便他的手尖触到我身上的任何部分，因此就牺牲一切，我也肯。我应当发疯，因为这些幻想中的异迹，梦似的，终于毫无困难的都给我得到了。但是从

这中间，我所感到的是我所想象的那些会醉我灵魂的幸福吗？不啊！”^{[4] 47}

当代美国著名作家、文艺批评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1933-2004)在其著作《疾病的隐喻》中指出：“任何形式对社会规范的背离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病态”^[5]。可见，莎菲是真正有“病”的，文本中对生理疾病的描写其实暗喻莎菲心理上的疾病。莎菲的“性爱乌托邦”，莎菲的个性诉求，莎菲灵与肉的欲望诉求是对社会规范的背离，注定无法实现。

其三，死亡欲望。

当自主生存的欲望与灵肉合一的欲望无法满足时，丁玲为她的主人公们深感困惑。基于倔强灵魂对现实的不甘妥协，于是演绎出死亡欲望。如莎菲的死亡欲望，莎菲把自己推向了一种完全与社会对立的绝境，经受生与死、灵与肉、理智与情感的自我分裂的痛苦，并沉溺于一种自我毁灭的感伤主义情调之中。因为无路可走，莎菲一次次的想到死亡，“我有如此一个美的梦想，这梦想是凌吉士给我的。然而同时又为他而破灭。我因了他才能满饮着青春的醇酒，在爱情的微笑中度过了清晨；但因了他，我认识了‘人生’这玩艺，而灰心而又想到死。”^{[4] 31}在莎菲的心目中，唯有死亡才可以决绝的驱除欲望和矛盾，死亡欲望成了莎菲在现世人生中唯一可以实现的欲望。丁玲的另一篇小说《阿毛姑娘》也诠释了这种残酷的死亡欲望。阿毛自我意识的觉醒带给她的是自我毁灭，从乡村到都市，是欲望被唤醒的过程，同时也是感受到欲望无从实现的痛苦的开始——“引诱她去欲望，而又不能给她满足”^{[6] 149}；更深一层的是，阿毛最终窥破了欲望本身也不过是一种幻觉——“幸福只在别人看去或是羡慕或嫉妒，而自身是始终也不能尝着这甘味”^{[6] 178}，于是生命本身也就无所留恋了。莎菲尚在生死之间挣扎，而阿毛姑娘已经走入死亡之渊。死亡欲望表明欲望者对自身的欲望有清醒的认知，是对欲望的反思。丁玲以“死亡欲望”为其早期的女性“欲望化”书写作了总结。这既真实的反映了五四知识女性觉醒后的欲望诉求，又反映了她们在最初的激情过后，那种“梦醒了无处可去”的痛楚。

应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一代知识女性的精神领域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与生命力。但由于社会发展阶段性的制约，政治、经济未曾经历根本性的改革，女性的经济独立远未达到支撑她们人格独立的程度。波伏娃在谈到衰落时期罗马女人的处境时，说她们是“虚假解放的典型产物，她们在男人实际上是唯一主人的世界上，只有空洞的自由：她们诚然是自由的——却没有结果。”^[7]这实际上也可以用来影射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女性的处境，她们依然处于社会边缘，连起码的生活需求都无法保障，根本谈不上真正的个性解放与欲望满足。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随着中国革命形势急剧变化，置身于血与火的时代中的女作家们已难以保持静观的超然心态，几乎都是描写满腔热情的革命女性与女性的革命，而作为个体存在的女人，无论肉体上，还是精神上的，比起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都显得微乎其微。这种革命氛围促成了“新妇

女”话语的转换,而丁玲本人也转向左翼文学,对革命的书写取代了对女性欲望的关注。因而在近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女性关于女性个体的现代欲望之旅,在革命的宏大叙事中一度中断。直到四十年代,张爱玲横空出世,女性“欲望化”书写才得以衔接。

二

1943年,张爱玲以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登上文坛,短短两三年间便成为上海沦陷区的一朵奇葩,创造了《传奇》出版后第四天即再版的传奇。作为当时主流话语中的异类,张爱玲自觉疏离政治,曾将五四运动比作一场她不喜欢的大规模的交响乐。许多人指责张爱玲视野狭窄,没有国家观念,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居然安闲、琐碎的描摹着庸常人生。但如果没有张爱玲这种疏离政治的书写,中国现代文坛上将会缺失一道关于女性真实欲望流露的风景线,因为政治会无情的扼杀个人欲望与性别欲望。

张爱玲继续着中国女性的欲望化书写,只是她笔下的欲望世界的主人公已不再局限于都市摩登女郎,而是延伸到了城市市民阶层,表现许多女性小人物的愿望、现实、矛盾、痛苦、敷衍、苟且等。在这里没有精神的飞扬,只求物质的安稳;没有反抗之歌,只有生存气息;没有远大理想,只求现世满足。张爱玲描摹的是关于物质欲望的图景,其笔下的女性同样深具现代气息,拥有独立的个性,有强烈的欲望诉求,但她们的“欲望”定格于“物欲”。这可视为对二、三十年代知识女性“精神欲望”的反拨,也是对前者无路可走之困境的突围。与丁玲的三重“精神欲望”相对应。在张爱玲笔下,也彰显了三重与物质有关的欲望。

其一,以“物”为基点,追求安身立命之本的欲望以及畸变的物欲。

自 19 世纪始,上海已初具国际都市化的气息,上海城市规模的都市化,经济结构的商品化,使上海人看重物质讲求实惠,重视个人生活享受。张爱玲生于斯长于斯,现代物质文明在她的心灵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因此,张爱玲总在小说中不遗余力的对家具摆设、衣着饰物、街头的电车、路边的蛋糕店等现代文明的产物进行描述。但张爱玲绝非简单的推崇物质,而是把“物”提到了一种生命力的高度。在当时女性经济地位卑微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她敏锐的看到了女性唯有经济独立,才能人格独立,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拥有自主生存的可能性。所以她不但鄙夷女性对金钱的追求,反而欣赏她们为了求得安身立命的根基而追求物质。物欲,几乎等同于女性生命力。同时张爱玲还肯定女性对物质文明的合理享受,在世纪末的黑色情绪中,相对于虚幻的精神世界,物质代表了安稳与现实,代表人生中可以触摸得到的实实在在的快乐。

在肯定世俗物质欲望的同时,张爱玲也透视了由于过度追求物欲导致的心灵悲剧。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留住了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8] 27}的富孀梁太太,梁太太骄奢淫逸生活的背面是空虚,空虚的背面是人格的扭曲。梁太太以物欲为诱饵,将自己的侄女,不谙世事的女中学生薇龙一步步诱向了黑暗的深渊。张爱

玲笔下另一个被物欲吞噬的典型人物便是《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与梁太太沉溺于过度物欲、情欲刺激不同,曹七巧是追求由“金钱”带来的安全感。正是基于对“物质”这一安身立命之本缺乏安全感,从而产生对自己的命运缺乏安全感的深度恐惧,才有了“曹七巧”这一戴着黄金枷锁的经典形象。这是男权制下畸变的女子阴暗心理、变态人格的真实写照。在张爱玲眼中,曹七巧的悲剧,除了有自身个性的因素,更多源于外界的压力,整个社会的弱肉强食,封建大家族内部的尔虞我诈,让这无人庇护的女子惶恐不安,她本能的抓住“金钱”作为救命绳索,以为抓住了金钱,就抓住了自己的命运。在曹七巧心目中,金钱的价值已超越了维持温饱生计的层面,上升到了精神寄托的高度。正因曹七巧的疯狂是时代的疯狂使然,时代的夜幕下还隐藏着千千万万个曹七巧,因而,张爱玲对她的批判中又渗入了深切的悲悯与同情。张爱玲对女性物质欲望的书写融入了精神观照,她希望女性能在追求物欲的过程中保持心灵平衡与人格健全,使物质能够真正成为女性安身立命之本。

其二,从女性经济地位出发,解构了“灵肉合一”的爱情乌托邦。

在张爱玲笔下,女人对物质的追求是始终存在的,因为那是她们安身立命之本。当女性不具备独立的经济地位时,她们的物质来源主要是男性,或者说是婚姻,婚姻成了获取经济保障的工具,其温情脉脉的面纱被剥离了。张爱玲笔下的女人,不再有丁玲的女主人公们那种关于爱情乌托邦的迷梦与困惑,她们清醒而又现实,精细的计算着自己的婚姻。《倾城之恋》就展示了女人在金钱和婚姻面前的脆弱与无奈,以及直面无奈人生的精明与坚韧。《倾城之恋》中的女主角白流苏是衰败大家庭中难以立身的离异女子,她没有经济实力独立生活,唯一的出路便是重新嫁人。当富商范柳原出现时,她把自己所有的赌注都押在了这花花公子身上,对她而言,婚姻是一种比其它许多职业都更有利的职业。至于爱还是不爱?在生活的困窘面前已经毫无叩问的意义了。文中有一段流苏的心理独白:

“总之,没有婚姻的保障而要长期抓住一个男人,是一件艰难的,痛苦的事,几乎是不可能的。啊,管它呢!她承认柳原是可爱的,他给她美妙的刺激,但是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这一点,她知道她可以放心。”^{[8] 196}

这一段独白显示了女性爱情乌托邦在经济压力面前的解体。一座城池的陷落最终成全了白流苏,这是张爱玲香港《传奇》中少有的喜剧结局——依然是透着灰色调子的。张爱玲以少年世故的笔触解构了五四以来追求爱情就是追求自由的神话。五四的爱情神话从冲出封建牢笼,自由恋爱、自由结合的新家庭模式开始,经历了狂飙突进的性爱乌托邦,到张爱玲这里,塌成了一片废墟。张爱玲笔下的女子,非但不谈爱情,还得依靠家庭谋生。

其三,“活着”的欲望。

无论是追求物欲还是解构爱情,其实都是“活着”两个字。与丁玲安排“死亡欲望”以示进入精神绝境不同,张爱玲借助“物欲”这一抹亮光照耀苦难中的女性跌跌撞撞往前

走。张爱玲曾说,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在乱世中,男人生存尚不易,更何况再遭一层压迫的女子。因此,能够直面惨淡的人生,能够坚强的“活着”,也昭示了一种独立人格,是一种平凡的伟大。张爱玲曾经在《谈女人》一文中写道:“如果有那么一天我获得了信仰,大约信的就是奥涅尔《大神勃朗》一剧中的地母娘娘。”^[12]“地母娘娘”代表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并且永远生机勃勃。《连环套》中的霓喜即是“地母型”的女人,她虽然不断遭到自私自利男人的抛弃,可生命力却愈加旺盛。《桂花蒸·阿小悲秋》中的苏州娘姨阿小赚钱养活自己和儿子,虽然对丈夫、雇主有琐碎的抱怨,但仍积极、主动的面对生活,她也是温暖的“地母”。张爱玲如是断言,“将来的荒原上,断瓦颓垣里,只有蹦蹦戏花旦这样的女人,她能够夷然地活下去,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到处是她的家。”^[10]翻开《传奇》,由开卷文本《金锁记》到压卷之作《桂花蒸·阿小悲秋》,张爱玲竟然连接起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女性的历史。可见,她一直在深思特定时代氛围下女性的命运与困境。“活着”就是张爱玲为时代女性提供的最基本的突围策略。

作为五四以后的女作家,丁玲与张爱玲有一些共同点:既关注传统女性的生存处境,也关注现代女性的心理情状;对男权文化包围中的女性性格弱点、生命本质进行剖析和审视;注重女性自身的欲望渴求,以女性体验书写女性欲望,探讨女性人格的建立。但因为具体的时空背景不同,个性不同,她们对女性的聚焦点也不同。张爱玲曾将人生划为“飞扬”与“安稳”两种类型。可以借此来印证她与丁玲写作的差异。丁玲的女性世界激情飞扬,关注女性精神欲望的张

扬;张爱玲的女性世界冷峻苍凉,以女性物质欲望的兑现为底子,关注其背后的人性之旅。她们关于女性欲望的书写在时间上连续,在内容上互补,相互辉映,共同凸显了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女性欲望化诉求之艰难曲折的心路历程!

[参考文献]

- [1] 袁良骏. 一玲研究资料[M].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248
- [2] 一玲. 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M]//一玲文集:卷5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4 84
- [3] 张瑞珍, 王中忱. 一玲研究在国外[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273
- [4] 一玲. 莎菲女士的日记[M]. 西安:西安出版社, 1995
- [5] Susan Sontag. illness as Metaphor[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78 56
- [6] 一玲. 在黑暗中[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上海开明书店, 1928
- [7] [美]波伏娃. 第二性[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 111
- [8] 徐看. 张爱玲小说全编:上卷[M]. 呼和浩特:文化出版社, 1995
- [9] 张爱玲, 张看[M].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2 49
- [10] 来凤仪. 张爱玲散文全编[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2 186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Ding Ling and Zhang Ailing's Writing about "Desiring"

YAN Han-yi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As feminist writers Ding Ling and Zhang Ailing told female desire through female experience, exploring the plight and seeking for the tactics of shaking off the plight about women since the May 4th movement. But they focused on different aspects. Ding Ling focu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spirited desire while Zhang Ailing focused on the importance of women's material desire for female survival. Their writings were continuous in time and complementary in content, both highlighting the arduous and tortuous spirit course about Chinese women's desire in 1920's—1940's.

Key words desire; female; spirit; substance